

明末清初西方世界地圖的在地化：熊明遇 「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考析*

徐光台**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明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入華繪製多幅中文世界地圖，將中國移到中央位置，並加入宇宙論、天文、曆法與世界各地國名和地理知識，以吸引中國士人注意，為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的初步在地化。受限於書籍尺寸大小，出於新奇或不同目的，中國士人將利瑪竇世界地圖簡略摹繪或調整，未學習西方繪圖傳統。熊明遇 (1579-1649) 接受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認為地圓而非方隅，中國不在地中。在《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批判朱熹 (1130-1200) 的宇宙生成與相關學說，為說明船航行於水多地少無罅礙的圓球上，提供「坤輿萬國全圖」，刻意將中國移回圖右側邊緣位置。在《地緯·地圖》中，熊人霖 (1604-1666) 雖摹繪此圖，卻將與陸地鄰近的海塗黑，以凸顯陸地與圍繞的海洋，改名為「輿地全圖」。

關鍵詞：西方世界地圖的在地化，利瑪竇，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熊人霖，輿地全圖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舉辦「傳統科學中的視覺呈現：東西方的地理圖與數學圖形工作坊學術研討會」（新竹：2013年5月31日）。論文獲兩位匿名評審提供寶貴意見，鄒振環教授與王永杰博士不吝給予建議，改進拙文，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榮譽退休教授，電子郵件信箱：kthsu@mx.nthu.edu.tw

一、前言

明末耶穌會士利瑪竇入華傳教，將西方世界地圖在地化，如李之藻 (1565?-1630) 刻《坤輿萬國全圖》(1602) 與李應試 (1560-?) 刊《兩儀玄覽圖》(1603)，其中傳入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兩個圓球式宇宙論 (two-sphere model of the cosmos)，也就是天圓地圓說，¹ 與相關天文曆法知識。二圖的起源、名稱與年代都相當清楚。² 相對地，清順治五年 (1648) 熊志學 (1605-1675) 將熊明遇³ 《格致草》與其子熊人霖⁴ 《地緯》合刻為《函宇通》，⁵ 中有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⁶ (見圖一) 與熊人霖「輿地全圖」⁷ (見圖二)，二小圖的起源與彼此間關係，以及是否受利瑪竇或其他世界地圖的影響，值得注意與研究。

過去對上述二小圖的繪製者、出處與彼此關連，以及是否受西方世界地圖影響，見解不一。有認為它們分別源自李之藻刻《坤輿萬國全圖》與吳中明刊《山海輿地全圖》，⁸ 有主張二圖源自奧特里烏斯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地球大

¹ 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始自柏拉圖 (Plato, 427-347 BC)，成於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David C. Lindberg,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600 B.C. to A.D. 1450*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 42-43, 90-91.

² 黃時鑿、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30-37。

³ 熊明遇生平與著作一手資料，見章士鴻，〈文直先生傳〉，收入熊明遇撰，熊人霖編，《文直行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6 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頁前 61a-69b；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年間刻本)，卷 5，〈文直行書初刻述事〉；卷 12，〈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257，〈熊明遇〉，頁 6629-66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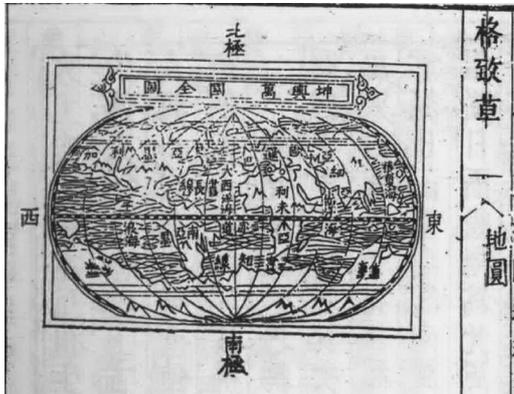
⁴ 熊人霖生平與著作，見洪健榮，《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 4-8。

⁵ 熊志學編，《函宇通》(美國國會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 (1648) 書林友于堂熊志學刻本)。其中元亨二冊為《格致草》，利貞二冊為《地緯》。本文引用版本分別為：熊明遇，《格致草》，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6 冊 (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 (1648) 書林友于堂熊志學刻本複印本)；熊人霖，《地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 (1648) 書林友于堂熊志學刻本微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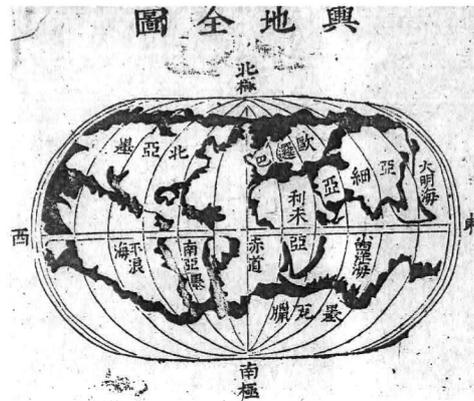
⁶ 熊明遇，《格致草》，〈圓地總無罅礙〉，頁 152b。

⁷ 熊人霖，《地緯》，〈地圖〉，頁 186a。

⁸ 林東陽，〈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收入羅光主編，《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頁 311-378。



圖一：《格致草》「坤輿萬國全圖」



圖二：《地緯》「輿地全圖」

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⁹ 有認為熊人霖「輿地全圖」與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職方外紀》(1623)「萬國全圖」相似，¹⁰ 亦有否定此種可能者。¹¹

由於《函宇通》二小圖彼此形似，¹² 多位學者主張先有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而後熊人霖將其收錄時改名「輿地全圖」。¹³ 至於繪製者，一般多將它們歸給《格致草》與《地緯》的作者。至於中國在二圖中位於右側邊緣位置，類似當時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所繪，與中國在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中央位置截然不同，因此認為它們不可能出自熊明遇父子，應源自與熊明遇同時代耶穌會士之手。¹⁴

儘管過去對上述二小圖有不同見解，熊明遇留下《綠雪樓集》、《格致草》與

⁹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頁 823；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係世界圖——主として新史料の検討〉，收入山田慶兒主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 507-580，特別是頁 539-540、567-572。

¹⁰ 馮錦榮，〈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收入羅炳綿、劉健明主編，《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 126-127。

¹¹ 龔纓晏、馬瓊，〈《函宇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文史知識》，4（北京：2003），頁 91、93-94；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53-54。

¹² 洪健榮，《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頁 83。

¹³ 龔纓晏、馬瓊，〈《函宇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頁 90；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53。

¹⁴ 龔纓晏、馬瓊，〈《函宇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頁 93；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54。

《文直行書》等著作，熊人霖亦有《地緯》、《南榮集》¹⁵ 和《鶴臺先生熊山文選》等，加上《格致草》前身《則草》有幅「坤輿萬國全圖」，¹⁶ 熊人霖於天啟四年 (1624) 撰《地緯》初稿，日後修訂刊刻，因此引發筆者探討二小圖源起的興趣，而關切下列問題：就像西方自然知識傳入中國在地化時，會產生選擇、改寫與調適，利瑪竇將西方世界地圖在地化時，是否加入特殊考量？中國士人參考其繪圖，進而在著作中呈現世界地圖，是否依各自歷史背景與脈絡而有所改變與調整？在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之前，是否已有些例證？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出自什麼歷史背景與脈絡？二者有何關連，在地圖文化史上具有什麼特殊的歷史意義？

筆者認為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涉及兩種不同層次與方向的在地化問題。一種始自利瑪竇，基於西方繪圖傳統，將中國折中性地移到地圖的中央位置，並加入宇宙論、天文、曆法與世界各地國名和地理知識，以吸引中國士人注意，為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的初步在地化。接著的是中國士人如馮應京 (1555-1606) 與章潢 (1527-1608) 分別參考利瑪竇不同的世界地圖，在《月令廣義》與《圖書編》兩本博物式作品中，受書籍尺寸的限制，出於新奇或不同目的調整，進行不同的簡略摹繪與調適，分別呈現「山海輿地全圖」¹⁷ 與「輿地山海全圖」，¹⁸ 未試圖了解或學習西方繪圖傳統，成為西方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兩個案例。在《則草》與《格致草》中，熊明遇接受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認為地圓，而非方隅，中國不在地中。天啟六年擴增《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批判朱熹的宇宙生成與相關學說，為說明船航行於水多地少無罅礙的圓球上，提供「坤輿萬國全圖」，刻意將中國移回圖右側邊緣位置，與中國在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中央位置截然不同。基於此圖，熊人霖在《地緯·地圖》中摹繪一圖，將與陸地鄰近的海塗黑，改名為「輿地全圖」，以凸顯五大洲陸地與圍繞的海洋。

¹⁵ 熊人霖，《南榮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十六年（1643）刊本）。

¹⁶ 熊明遇，《則草》（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 14b；熊明遇，《綠雪樓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8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年間本影印），《則草》，《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 14b。由於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本的「坤輿萬國全圖」較清楚，本文採用該本的圖。凡未申明採用中國南京圖書館藏《則草》本，則出自《綠雪樓集》。

¹⁷ 馮應京輯，戴任增釋，《月令廣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6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清華大學藏明萬曆陳邦泰刻本複印），首卷，頁 60b-61a。

¹⁸ 章潢，《圖書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故宮博物院藏本複印），卷 29，頁 43b-44a。

在進行步驟方面，以下先處理萬曆年間士人對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在地化調適。接著分析萬曆末年熊明遇初刻《則草》，接納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乾坤體義》傳入的天圓地圓說。第四節介紹天啟六年《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坤輿萬國全圖」與相關說明源起的歷史背景。第五節探討熊人霖《地緯》與其中「輿地全圖」與相關說明源起的歷史背景。第六節處理崇禎十一年初刻《地緯》中的「輿地全圖」。最後闡明本研究的歷史意義。

二、從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在地化看萬曆年間士人作品內圖繪的調適

明萬曆年間利瑪竇入華後，參考西方世界地圖、中國地圖與文獻，以及他的觀測，¹⁹ 基於西方繪圖傳統，加入特殊考量，完成多幅中文世界地圖，刻意將中國移到地圖的中央位置。本節以現存《坤輿萬國全圖》（見圖三）為例，介紹其將西方世界地圖初步在地化的一些特性。接著以萬曆年間馮應京《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與章潢《圖書編》「輿地山海全圖」為例，²⁰ 凸顯士人雖參考利瑪竇世界地圖，卻未思考學習西方繪圖傳統，僅簡略摹繪與調整，反映利瑪竇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一些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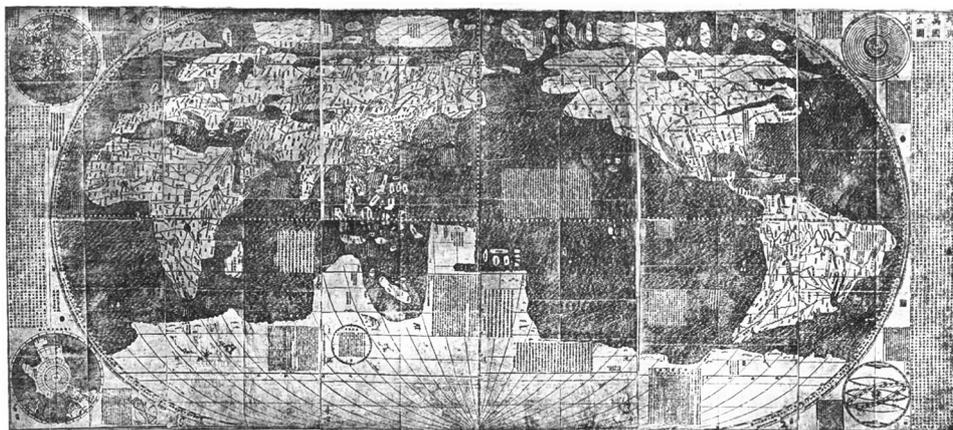
（一）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現存《坤輿萬國全圖》有相當豐富的宇宙、天文、曆法與自然哲學等知識，記載非常多世界各地的國名、地名與海洋等地理知識，與此圖的名稱相符。利瑪竇藉此吸引中國士人注意西方自然知識，包括 (1)「九重天圖」與說明；(2) 在九重天圖下方有段說明，引述《元史》記載中國地表所測各地晝夜長短不一，反映元人在當時地理疆域上是最遠的，提出的說法有其方法上的根據。比起元人，利瑪竇來自更遠的遠西，何況在《坤輿萬國全圖》中還有一些更清楚的方法或理論的依據；(3)「天地儀圖」與說明；(4) 對球面上的直橫度數來論其里分，提供一個表與直弦關係的說明，來「總論橫度里分」；(5) 夜看北極法；(6)「太陽出入赤道緯度」表結合中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從太陽所在赤道的位置，知道出北極的高低，推論所在處；(7)「日蝕圖」與「月蝕圖」；(8)「赤道北地半球之圖」；(9) 周天黃、赤二

¹⁹ 黃時鑿、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63-86。

²⁰ 同前引，頁 13-15、22-23、48-56。

道錯行中氣之界限；(10)「赤道南地半球之圖」。



圖三：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

此外還反映一些與本文有關的特色，茲摘要於下。

1. 採西方投影製圖法，完成像今日田徑跑道式的橢圓形圖。由東西兩半球合成，各球靠中間的半球，改為上下扁平的形方，在外側的半球維持其半球形。橫的十二方，豎的六方，共七十二方，每方上下與左右各表三十度。受紙張尺幅所限，可能以小紙張拼接成此巨幅地圖，使其看來像似展現出由一張大紙畫出小格的畫方的方式。

2. 圖的外圍有三圈，最內一圈表緯度，周天三百六十度，以每五度為一個單位，採黑白相間來標示出該緯度單位；第二圈則依緯度將地球南北緯度分為五個氣候帶，表明各帶的日影狀況；最外一圈以每五度為一個單位，表明所在緯度處的夏晝或冬夜的長短。

3. 圖內有五條經度橫線，正中央一條表示「赤道晝夜半線」，以黑白相間每隔十度標記經度的度數。以北半球立場來看太陽在黃道的軌跡，北緯二十三度半有條「晝長線」，南緯二十三度半有條「晝短線」；再來則是北緯六十六度半的「地北極界」，也就是北極圈線；在南緯六十六度半的「地南極界」，亦即南極圈線。以上五條橫線依南北緯度將地球分為五帶：北極圈帶、北溫帶、赤道帶、南溫帶與南極圈帶。

4. 五大洲名稱為歐邏巴、利未亞、亞細亞、南北亞墨利加、墨瓦臘泥加。

5. 四個相關海洋名稱為：大明海、小西洋海、大西洋海、寧海。
6. 不同於當時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將亞細亞、利未亞與歐邏巴置於右半，中國在右側邊緣位置，利瑪竇將亞細亞、利未亞與歐邏巴移到地圖左半，於是中國出現在圖的中央位置。

通過上述特性，利瑪竇希望吸引中國士人注意與學習西方自然與地理知識。

(二) 萬曆年間不同脈絡下士人作品內圖繪的利瑪竇世界地圖

受到利瑪竇在不同地方繪製世界地圖的吸引，也就是參考初步在地化的西方世界地圖，馮應京與章潢分別繪製《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和《圖書編》「輿地山海全圖」，成為另一層次在地化的世界地圖，中國都出現在圖的中央位置。茲分別分析如下。

1. 馮應京《月令廣義》仿製的「山海輿地全圖」

受利瑪竇傳入另類的西方宇宙論與天文曆法影響，馮應京參考吳中明刊刻《山海輿地全圖》，在《月令廣義》這本依照《禮記·月令》一年十二個月時令的博物式輯本中，納入三幅與利瑪竇世界地圖有關的新奇小圖，分別為「九重天圖」、「天地儀」圖與「山海輿地全圖」。茲以「山海輿地全圖」為例，分析如下。

由於《山海輿地全圖》原圖的尺寸不小，受書籍篇幅的限制，《月令廣義》的「山海輿地全圖」為橫跨版心左右二頁的一幅小圖（見圖四），²¹ 相對原先「巨幅」《山海輿地全圖》，既有摹仿，亦有選擇性的調整，以士人觀點繪製成一個近乎圓的小橢圓世界地理圖，取名與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相同。

原先《山海輿地全圖》中諸多圖文資訊，受《月令廣義》篇幅限制，只能以簡略的文字說明。例如，利瑪竇世界地圖外圍的三圈，《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以一圈表示，卻在圖的四角加上四條注記。

- 「外三圈天球定天度、晝夜長短、影候」；
- 「圖中橫豎三十六方，每方中各十度」；
- 「內一圈地球，分天地五洲，區境之略」；
- 「地球橫豎經緯界線，別方隅，稽度數」。

²¹ 馮應京輯，《月令廣義》，首卷，頁 60b-61a。



圖四：《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

由於《山海輿地全圖》已失佚，在對這四條注記作一些分析後，吾人可參照現存《坤輿萬國全圖》（見圖三），對其中相關圖文內容加以比較與對照。

首先，《坤輿萬國全圖》外三圈各有其明確的內容與意義，由內而外標示天度、五帶的影候與不同緯度的晝夜長短；相對地，《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只有一個在外的空白圈，以文字注記反映其所本的《山海輿地全圖》「外三圈天球定天度、晝夜長短、影候」。

其次，《坤輿萬國全圖》橫的十二方，豎的六方，共七十二方，每方約表三十度。已失佚的《山海輿地全圖》或有類似的處理。《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出現的是「橫豎三十六方」，以及「每方中各十度」，反映繪此圖者將原先以橢圓方式展開的世界地圖，改為朝向圓球方向來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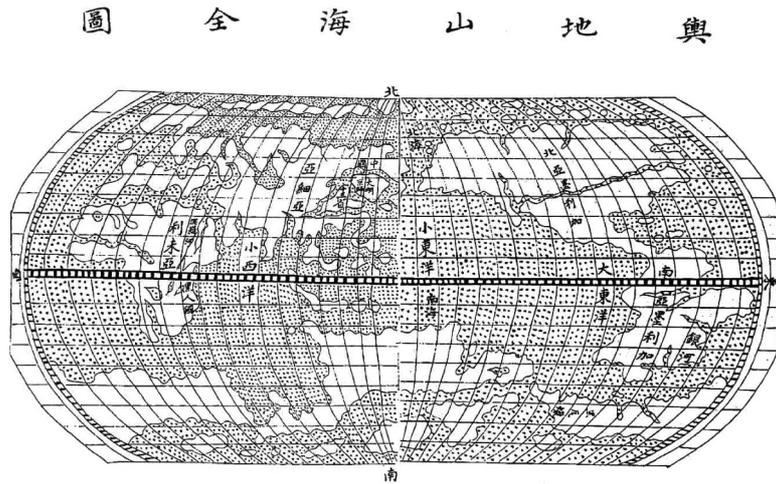
第三，以第二圈之內的圖來表地為圓球，實際上將它分為五大洲，卻說「分天地五洲，區境之略」。圖中的大洲名稱為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南北亞墨利加與墨瓦臘泥加。

第四，大地是圓球，與傳統中國認為地方有其隅的看法迥然不同，因此特別強調「別方隅」。原先「巨幅」的圖上有「地球橫豎經緯界線」，因此可以稽查圓球上各處的度數圖中有南極與北極，標示南北方向，但無固定的東西向。

2. 章潢《圖書編》仿製的「輿地山海全圖」

章潢《圖書編》也是一本明末博物式的類書，除了編輯嚴謹以外，取左圖右書

之意，收集大量傳統的易圖與各類圖說，其中「輿地山海全圖」²²（見圖五）反映章潢仿製利瑪竇在南昌時期傳入的世界地圖所做的一些選擇。



圖五：章潢《圖書編》「輿地山海全圖」

茲將由外而內，從右向左分析此圖的特色如下。

其一，有意識地標示東西與南北向。北表北極，南表南極，較特殊之處在將圖右方標示為東，左方則為西。

其二，圖的外圍有三圈，最外一圈左右各分割為十八段，每段為二十度，內空白無字；中間一圈空白無字；第三圈以黑白相間表示緯度的刻度，但未留下任何度數的標記。

其三，圖內橫向的中央有一條黑白相間的經度直線橫貫東西，表示赤道，但未留下度數的標記。

其四，圖的右半標示北亞墨利加、南亞墨利加與黑瓦臘三大洲陸地名稱，還有大東洋、北海、小東洋、南海等海名。圖的左半有亞細亞與利未亞二大洲陸地名稱，未標示歐邏巴，還有小西洋。亞細亞靠近圖的中央記有中國、大明京師、十三省；利未亞中有黑人國。

綜合本節的分析，筆者認為利瑪竇的中文世界地圖是初步在地化，有其特殊考量，特別是將中國移到圖的中央位置。馮應京《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與章

²² 章潢，《圖書編》，卷 29，頁 43b-44a。

潢《圖書編》「輿地山海全圖」是中國士人將利瑪竇世界地圖另一層次在地化，受限於書冊大小，依其各自博物式目的做出簡略摹繪或調適，中國都出現在圖的中央位置。受耶穌會士傳入世界地圖的影響，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可能經過將利瑪竇世界地圖另一層次在地化的過程，至於他們做出什麼的選擇與調整，以下擬從兩人生平著作與書中世界地圖源自的歷史背景來瞭解。

三、熊明遇初刻《則草》

雖然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未出現在萬曆末年初刻的《則草》中，不過那時他已參考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乾坤體義》內容，接受亞里斯多德兩個圓球式宇宙論，為天啟六年擴充《則草二》中出現「坤輿萬國全圖」提供必要的歷史背景。

(一) 萬曆末年初刻《則草》

熊明遇，字良孺，號壇石，江西進賢人，萬曆七年（1579）生於江西豫章進賢縣。二十九年進士，翌年秋任長興知縣。三十七年底任禮部主事，次年夏考選兵科給事中，不久丁憂返鄉守喪。四十一年暮春返京待補兵科給事中，四十三年底履任，其間兩年八個月與耶穌會士龐迪我（Didaco de Pantoja, 1571-1618）、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i, 1582-1649）交往，以及徐光啟（1562-1633）交遊，²³ 並為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 1575-1620）《表度說》（1614）與龐迪我《七克》（1614）寫序，翌年參與陽瑪諾《天問畧》（1615）的校閱。

萬曆四十四年，齊、楚、浙黨與東林黨爭，齊黨禮科給事中元詩教等以熊明遇與東林黨通為由，上書彈劾，隔年外調福建兵備僉事。²⁴ 而後兩年，上疏託病，返鄉休養。藉此時機，以所學西方自然知識來考據傳統自然知識，完成《則草》初稿。²⁵ 將基於氣的自然哲學的中國傳統占候或占星與西方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和

²³ 「先君子久與龐、陽、徐、畢諸君遊。初刻《則草》，始章西學。」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1，〈懸象說〉，頁 1b。

²⁴ 「元詩教等以明遇與東林通，出為福建僉事。」張廷玉等，《明史》，卷 257，〈熊明遇〉，頁 6630。

²⁵ 過去認為《則草》「稿成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前後」。馮錦榮，〈格致草提要〉，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6 冊，頁 51。

托勒密數學天文學相比，熊明遇覺得傳統占候或占星背後「占理」粗疏，²⁶ 凸顯於《則草》前兩節〈占理膚論〉與〈占理演說〉中。初刻的《則草》，引用李之藻《渾蓋通憲圖說》(1607) 頗多，參考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或《乾坤體義》(ca. 1608-1609) 內容，特別是亞里斯多德兩個圓球式宇宙論。萬曆末年 (1620) 二月，熊明遇在福寧逍遙閣撰〈則草引〉，顯示《則草》約於當時刊刻，內容包括〈則草引〉、《則草〔一〕》、與〈則草附〉三部分，共有 34 節。

(二)《則草》對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或《乾坤體義》的參考或引述

在〈欽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文〉(1615) 中，曾任應天府尹與利瑪竇熟識的王應麟 (1545-1620) 提到熊給諫，也就是熊明遇，在萬曆三十七年底至三十八年春利瑪竇病逝前，擔任禮部主事時與利瑪竇交往。²⁷

《則草》〈天地定體〉與〈定天列象〉多處參考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或《乾坤體義》，茲列舉如下。

天圓地方，自德言也。²⁸

其實天地皆圓體。²⁹

西方人泛海至大浪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地方足

趾相對，即今之陝西也。³⁰

²⁶ 「及遊長安，與博見疆志之士極議一堂之上，間嘗取腋于四夷之官，補天子之學，而後乃知星氣之言猶疏也，作《則草》。」熊明遇，《則草》，〈則草引〉，頁 1b-2a。

²⁷ 王應麟，〈欽敕大西洋陪臣葬地居舍碑文〉，收入楊廷筠編，《絕徼同文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 (1615) 本），卷 2；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04、128-129。

²⁸ 「地……居天球之中……有謂地為方者，語其德靜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利瑪竇撰，《乾坤體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故宮博物院藏本複印，以下簡稱四庫全書本），卷上，〈天地渾儀說〉，頁 1a。

²⁹ 「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收入利瑪竇著，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7；利瑪竇，《乾坤體義》（四庫全書本），卷上，〈天地渾儀說〉，頁 1a。

³⁰ 「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相對待矣。」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頁 218；「過大浪峯，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峯與中國相對待矣。」利瑪竇，《乾坤體義》（四庫全書本），卷上，〈天地渾儀說〉，頁 2a-2b。從南北極出地度數相對來看，當時中國陝西的北極出地度數為三十六度。陽瑪諾，《天問畧》，收入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 5 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陝西省城及鄰近地方晝夜長短日出日入朦影刻分〉，頁 29a；熊三拔，《表度說》，收入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 5 冊，〈北極出地度數及春秋分冬夏

瑪八作南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又與南京相對矣。³¹

月離地中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里餘，辰星離地中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有餘，太白離地中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里餘，日離地中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此外，即係一日一周之天，包絡轉運，此天離地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里餘，其遠近各有測算之法。³²

蓋諸星之體甚鉅，只因離地絕遠，故人眼見得甚微。若從星上看地，決如一塵不能見矣。³³

此外，《則草》〈定天重數〉有一不著圖名的九重天圖³⁴（見圖六），可能參考《坤輿萬國全圖》中的「九重天圖」³⁵（見圖七）。

儘管利瑪竇《輿地山海全圖》已失佚，章潢曾參考其中「九重天圖」，只是《圖書編》「九重天圖」與說明有些更動與調整（見圖八）；³⁶ 相對地，《則草》可能參考當時流傳較廣的《坤輿萬國全圖》「九重天圖」，〈定天重數〉中的九重天圖與其內文字亦有些調整。

至表景度分），頁 30b。

³¹ 「設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焉。如所離中線度數又同而差南北，則兩地人對足底反行。故南京離中線以北三十二度，……而南亞墨利加之瑪八作離中線以南三十二度，……則南京於瑪八作人相對反足底行矣。」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頁 218-220。《乾坤體義》略有調整。見利瑪竇，《乾坤體義》（四庫全書本），卷上，〈天地渾儀說〉，頁 2a-2b。

³² 「余嘗留心於量天地法，且從太西庠天文諸士討論已久，茲述其各數以便覽焉。……地心至第一重謂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餘里；至第二重謂辰星即水星天，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至第三重謂太白即金星天，二百四十萬零六百八十一餘里；至第四重謂日輪天，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至第九重謂宗動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頁 222；利瑪竇，《乾坤體義》（四庫全書本），卷上，〈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頁 5a-6a。

³³ 「使有人在第四重天已上視地，必不能見，則地之微比天不啻如點焉耳。」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頁 223；「使有人在第六重天已上視地，必不能見之，則其微比天者不啻如粒焉耳。」利瑪竇輯，畢懋康演，《乾坤體義》（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明萬曆年間刻本），卷上，〈地球比九重天之星遠且大幾何〉，頁 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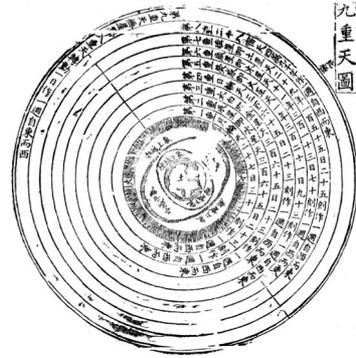
³⁴ 熊明遇，《則草》，〈定天重數〉，頁 14b。

³⁵ 黃時鑿、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31 圖版十九。

³⁶ 章潢，《圖書編》，卷 16，頁 62a。



圖六：《則草·定天重數》不著圖名



圖七：《坤輿萬國全圖》「九重天圖」



圖八：《圖書編》「九重天圖」

綜言之，雖然萬曆末年刊刻《則草》中未見「坤輿萬國全圖」，但已參考或引述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乾坤體義》內容，特別是〈定天重數〉中有一不著圖名的九重天圖，反映《則草》接受《坤輿萬國全圖》「九重天圖」中亞里斯多德兩個圓球式宇宙論。

四、天啟六年擴增《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的 「坤輿萬國全圖」

雖然熊明遇《格致草》「坤輿萬國全圖」名稱與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相同，可是前者中國位於圖右邊緣，因此過去提出「熊明遇父子受到利瑪竇的影響不大，《函字通》中的世界地圖並非利瑪竇所作」，³⁷ 認為實質上是摹仿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大概是由於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當時已非常著名，所以譯繪此圖的傳教士也就借用了這個名稱。」³⁸ 進而追溯熊明遇父子可能目睹奧特里烏斯世界地圖的時機。³⁹

事實上，天啟六年熊明遇擴增《則草》時，〈圓地總無罅礙〉有幅「坤輿萬國全圖」。於是引起筆者的好奇：為何「坤輿萬國全圖」會出現其中？有何特殊旨意？認為如果回到《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的脈絡，將該小圖視為西方世界地圖另一層次在地化的一個特殊案例，吾人或可了解他繪製此圖的歷史意義。

筆者發現：受利瑪竇批判朱熹自然哲學的影響，熊明遇基於亞里斯多德兩個圓球式宇宙論，特別是借助《寰有詮》中地圓說的見解，指出地圓與地有一隅，以及中國位於天下的地中不相容，並將耶穌會士傳入的亞里斯多德宇宙論與朱熹理學中結合陰陽五行之氣的渾天說做一對比，顯示亞里斯多德宇宙論優於朱熹自然哲學的渾天說。地雖為一圓球，實際上卻是水多地少的，在此脈絡中，為說明船航行於此一水土合成的圓球上，熊明遇進而提供一小幅名為「坤輿萬國全圖」的世界地圖。

(一)天啟六年擴增的《則草二》

天啟三年，傅汎際 (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 與李之藻開始翻譯《寰有詮》。⁴⁰ 四年六月，楊漣 (1571-1625) 上疏彈劾魏忠賢 (1568-1627) 二十四條大罪，東林人士與魏忠賢黨人勢不兩立。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與南京兵部尚書

³⁷ 龔纓晏、馬瓊，〈《函字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頁 93；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53-54。

³⁸ 龔纓晏、馬瓊，〈《函字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頁 94；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 56。

³⁹ 洪健榮，《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頁 83-84。

⁴⁰ 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 205。

陳道亨 (1552-1628) 上〈權黨罪狀已著疏〉贊同楊漣，陳道亨旋請告歸。該年冬，魏忠賢與其黨人開始大肆攻擊東林黨人。五年三月，魏忠賢興大獄，二十餘位大臣被下獄或削籍，楊漣等受酷刑死於獄中。藉汪文言獄案，魏忠賢裁賊熊明遇，矯旨將其革職，謫貴州平溪衛。⁴¹

在天啟六年九月中動身前往貴州平溪衛以前，熊明遇有一年半時間賦閒，得以增添《則草二》，其中引用包括天啟年間刊刻的艾儒略《職方外紀》、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遠鏡說》(1626)、《主制群徵》(1626) 與先前已參考的西學著作，還有天啟五年夏初譯畢初稿的《寰有詮》。儘管此書在崇禎元年 (1628) 才刊刻問世，⁴² 熊明遇先閱讀譯稿，並筆記摘錄。在對當時現世政治感到極端絕望的情況下，熊明遇轉而寄望耶穌會士傳入的基督宗教性神學，特別是天主教在人往生後對其在地活動的審判與末世審判。在《則草二》中，他納入基督宗教性神學的六日創世與末世審判，以及一些自然神學內容，但未皈依入教。⁴³ 其中大量引用與改寫《寰有詮》首卷內容，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則草二·大造演說》引用或改寫介紹六日創世的部分，⁴⁴ 還參考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天主實錄》、王豐肅 (Alfonso Vagnoni, 1566-1640)《教要解略》與龐迪我《龐子遺詮》等作品。⁴⁵ 與本文有關的是，《則草二》有一小幅「坤輿萬國全圖」，它是現存熊明遇文獻中最早的「坤輿萬國全圖」，因此有必要對其出現的小節圖文與相關內容進行分析，以明瞭該圖產生的歷史背景與脈絡。

(二)《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的意旨：凸顯地圓與批判地有方隅

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為批判朱熹自然哲學，引入亞里斯多德《範疇論》，認為朱熹理學的太極或理不是自立體，不能生物。⁴⁶ 在《乾坤體義》中，

⁴¹ 「五年三月給事中薛國觀遂劾其黨庇徇私，忠賢即矯旨革職。未幾，坐汪文言獄，追贓千二百金，謫戍貴州平溪衛。」張廷玉等，《明史》，卷 257，〈熊明遇〉，頁 6630。

⁴² 方豪，《李之藻研究》，頁 205-206；傅汎際譯，李之藻達辭，《寰有詮》，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8 冊，頁 451-641。

⁴³ 徐光台，〈西方基督神學對東林人士熊明遇的衝激及其反應〉，《漢學研究》，26.3 (臺北：2008)，頁 191-224。

⁴⁴ 過去多從自然哲學觀點注意《寰有詮》與其對《格致草》的影響，如石云里，〈《寰有詮》及其影響〉，收入薄樹人、劉金沂、徐振韜、王立興、李競等主編，《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 6 集 (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232-260。

⁴⁵ 徐光台，〈西方基督神學對東林人士熊明遇的衝激及其反應〉，頁 202-204。

⁴⁶ 利瑪竇，《天主實義》，收入李之藻編，《天學初函》第 1 冊，上卷，〈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

基於亞里斯多德兩個圓球式宇宙論，歐幾里德光學與托勒密數學天文學，利瑪竇批評朱熹「月亢日」說不合理。⁴⁷

萬曆三十七年底，熊明遇赴北京就任禮部主事。在利瑪竇過世前，兩人曾有數月交往。在萬曆末年初刻《則草》中，出現多條批判朱熹見解之處。

儒者謂：月亢日而月為之食。⁴⁸

朱子《詩經·十月之交》註曰：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⁴⁹

《朱子語類》曰：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角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⁵⁰

回到《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內文始自：

地形既圓，水抱地，氣抱水，火抱氣，與星月諸天，層層相抱，必渾為圓。不然，則重重相接之間，容有虛罅，豈理也哉。雖無虛罅，却無窒礙，航海者如循環。然人第見水之東流，不曰地平，則曰地為東下，此就一隅着眼耳。⁵¹

將水與陸地合成視為一圓球，則「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並以船航行於水多地少的圓球上，「可航而歷也」，來歷驗

主》，頁 19aff。

⁴⁷ 「或以為抗日，非其理也。」利瑪竇輯，《乾坤體義》，卷中，頁 9a。

⁴⁸ 熊明遇，《則草》，〈日月交食〉，頁 15b；「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朱熹集撰，朱傑人點校，《詩集傳》，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1，〈小雅·十月之交〉，頁 591；「月蝕是日月正相照。……蓋陰盛亢陽，而不少讓陽故也。」朱熹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2，〈理氣下·天地下〉，頁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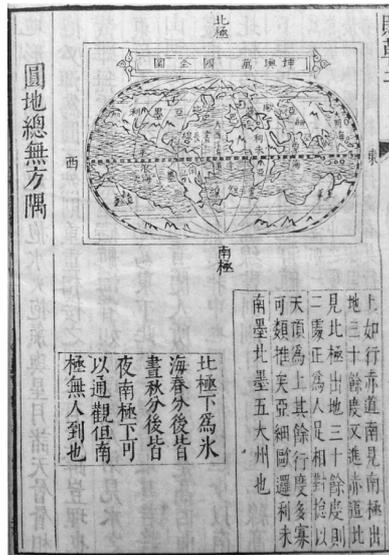
⁴⁹ 熊明遇，《則草》，〈日月交食〉，頁 17b；朱熹集撰，《詩集傳》，卷 11，〈小雅·十月之交〉，頁 591。

⁵⁰ 熊明遇，《則草》，〈晝夜長短〉，頁 20a-20b；「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朱熹，《朱子語類》，卷 1，〈理氣上·太極天地上〉，頁 7。

⁵¹ 熊明遇，《則草》，《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 14a。

水土合成的圓球。⁵²

接著，熊明遇根據基督教義化下的亞里斯多德宇宙論，將朱熹宇宙生成說加以改寫為：「宋儒言：天旋如磨，〔磨〕下許多粉子凝結為地」，⁵³ 主張該項說法是「可一大噓」，並進而改寫朱熹另一主張為：「海那一岸，與天相粘」，⁵⁴ 最後評論朱熹見解為「皆屬管中之窺。」⁵⁵



圖九：《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坤輿萬國全圖」

⁵² 同前引。

⁵³ 同前引。此句改寫自《朱子語類》。「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推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朱熹，《朱子語類》，卷1，〈理氣上·太極天地上〉，頁6。

⁵⁴ 熊明遇，《則草》，《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14a。此句改寫自《朱子語類》。「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海那一岸便與天接。」朱熹，《朱子語類》，卷2，〈理氣下·天地下〉，頁27-28。

⁵⁵ 熊明遇，《則草》，《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14a。

〈圓地總無罅礙〉的「無罅礙」，指諸天與地域間無虛罅，在土水合成的圓球上航海亦無罅礙。為了說明圓地是水多地少的圓球，是「可航而歷也」，而不是朱熹自然哲學的渾天說主張海天相黏的大地見解，熊明遇進而提供一小幅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⁵⁶（見圖九）。

（三）《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的出處

過去認為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是某位傳教士完全摹自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而不是來自利瑪竇，受其影響不大，只因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在當時非常有名，因此該位譯繪此圖的傳教士就借用其名稱。⁵⁷此一看法未提是哪位傳教士譯繪該圖，也忽略它與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間的差異。

筆者認為熊明遇《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1626）是中國士人將西方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在地化的一個案例，在其前已有《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1602）與章潢「山海輿地全圖」（1613）等。《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佔有一葉的雙頁，《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僅有一頁的五分之二，圖所佔的比例來得更小，這個再度在地化的過程不可能出自耶穌會傳教士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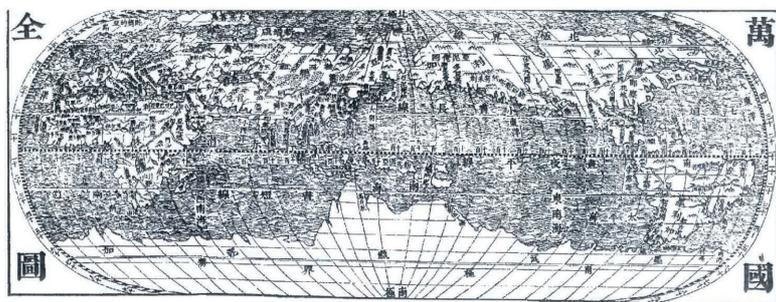
1626年，可參考的西方世界地圖包括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艾儒略《職方外紀》中的「萬國全圖」（見圖十），⁵⁸以及耶穌會士攜入包括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見圖十一）在內的世界地圖。其中以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最有名，在中國流傳最廣。利瑪竇將中國置於圖的中央，艾儒略「萬國全圖」亦將中國置於中央。如此的調整卻不符合熊明遇的需要，因為在《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熊明遇已了解「若將山河、海陸渾作一丸而看，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⁵⁹

⁵⁶ 熊明遇，《則草》（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本），《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14b。

⁵⁷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53-56，特別是頁56。

⁵⁸ 艾儒略，《職方外紀》，收入葉農整理，《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萬國全圖」，頁27-28。

⁵⁹ 熊明遇，《則草》，《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14a。



圖十：艾儒略《職方外紀》「萬國全圖」



圖十一：奧特里烏斯 1570 年《地球大觀》

另一方面，熊明遇返京候補兵刻給事中，與耶穌會士交遊，接觸他們攜入中國的書籍。因此在《則草二》中，出現一幅類似橢圓的小世界地理圖（見圖九），內容很簡略，從外而內介紹其大要如下。

1. 有意識的將此圖繪於一長方形框架，並於框架外，標示出北極與南極所在處，最特殊之處是熊明遇依其理解東西方位的立場，將圖右方標示為東，左方則為西，這與《表度說》和《天問畧》強調東西是相對的說法頗為不同。

2. 圖的外圍有兩圈，最外的第一圈空白，沒有任何標示與說明。第二圈則以黑白相間的曲線段來表示緯線，但未留下任何度數的標記。

3. 圖內橫向的中央有一條黑白相間的經度直線橫貫東西，表示赤道，但未留下度數的標記。

4. 圖中有「晝長線」三字與「晝短線」三字，但未在圖上標示二線，但是有北極圈線與南極圈線。

5. 圖中的五大洲名稱由東至西分別為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北亞墨利加與南亞墨，此外還有未標名稱的北極與南極附近的陸地。

6. 從東至西海洋名稱有四：大明海、小西洋海、大西洋海、平浪海。

7. 類似當時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將中國畫在右側邊緣位置。

此圖雖類似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但也存在以下一些差異。(1) 後者以十度為單位來詳標經緯度，前者則以三十度來標經度，雖有北極圈線與南極圈線，以及「晝長線」三字與「晝短線」三字，但未標緯度線。中央有一條黑白相間的經度直線橫貫東西，表示赤道，但未留下度數的標記。(2) 此圖的外圍有兩圈。內圈表緯度，採黑白相間來標示緯度卻無度數，這方面卻像受到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影響。(3) 此圖雖無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第二圈，外圈亦空白，但是其赤道線、「晝長線」、「晝短線」、北極圈線與南極圈線等，反映熊明遇知曉外圈表明所在緯度處晝夜與冬夏長短，還有大明海也受到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影響。

依據上述分析，熊明遇會在《則草二》中為該圖取名「坤輿萬國全圖」，該圖確受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影響。事實上，在該圖之前有段文字說明，其內容亦反映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影響。

後坤輿圖原是渾圓，經線俱依南北極為軸，東西衡貫者，則赤道線也。行海者，其行雖在地上，其測量却在天上。如行赤道南，見南極出地三十餘度；又進赤道北，見北極出地三十餘度，則二處正為人足相對。總以天頂為上，其餘行度多寡，可類推。亞細、歐邏、利未、南墨、北墨，五大州也。⁶⁰

熊明遇在萬曆三十七年底就任禮部主事，應有機會在宮中見到《坤輿萬國全圖》。註 60 引文中的「如行赤道南，見南極出地三十餘度；又進赤道北，見北極出地三十餘度，則二處正為人足相對」，似乎是基於先前註 30 與註 31 的概括，而這兩個註都基於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的說明文字。

此圖名稱是「坤輿萬國全圖」，引文提到的卻是「坤輿圖」，乍看之下有些矛盾，筆者認為「坤輿圖」是「坤輿萬國全圖」的簡稱。由於圖本身遠較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來得小，未標任何國名，不宜稱其為「萬國全圖」，乃去除「萬國全」三字，縮為「坤輿圖」。另一方面。圖左下方的文字為：「北極下為冰海，春

⁶⁰ 熊明遇，《則草》（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本），《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 14a-14b。

分後皆晝，秋分後皆夜；南極下可以通觀，但南極無人到也。」反映熊明遇曾參考《職方外紀》的內容。⁶¹

綜言之，熊明遇《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是西方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在地化的一個特殊案例。從其出現在《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來看，熊明遇為了說明船航行於水多地少的圓球上，是「可航而歷也」，乃提供此幅「坤輿萬國全圖」的世界地圖，以及一段相關的文字說明。他接受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認為地是圓的，而非方隅，中國不在地中，與中國位於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央位置截然不同的，乃將中國移回圖右側邊緣位置，像似當時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中的位置，造成熊明遇《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與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顯著的不同。其中混合了來自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艾儒略《職方外紀》，以及當時中國在西方標準投影世界地圖中所在位置的影響，並加入一些特殊考量。如將它與上述西方世界地圖相比，繪製與刻印得較粗糙，內容也相當簡略，不像是出自耶穌會士之手。

五、熊人霖《地緯》「輿地全圖」的源起

明清鼎革，熊人霖與其父避居書林，熊志學將《格致草》與《地緯》合刻，《地緯》中有一小幅名為「輿地全圖」的世界地圖，這是現存唯一的熊人霖「輿地全圖」。要瞭解此圖的源起，得從《地緯》的起源起談起。不同於過去認為《地緯》成書於天啟四年，⁶² 筆者認為此書從起源至《函宇通》刻本，前後經歷三個階段：(1) 天啟四年的書稿；(2) 崇禎十一年初刻；(3) 順治五年重刻。

首先回到天啟三年 (1623) 出版的《職方外紀》對熊人霖帶來相當的衝激，次年他撰寫《地緯》手稿，大量引述或改寫《職方外紀》的內容，其中是否已有「輿地全圖」，有待探討。其次，從初稿到崇禎十一年刊刻出版時，所做的修改。最後

⁶¹ 「又或隨其本地方隅命之，則在南者謂南海，在北者謂北海，……近北極下為北海。」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 5，〈四海總說〉，頁 146-147；「而南海則人跡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冰海。」「南海，指南極附近一帶的海洋。」同前引，〈海名〉，頁 147、148 註 3；「至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同前引，〈海狀〉，頁 155。

⁶² 洪健榮，《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頁 9、33；馬瓊，〈《地緯》的成書、刊刻與流傳〉，《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8.4（無錫：2009），頁 73。

則是《函宇通》本重刻《地緯》，因此其中「輿地全圖」（見圖二）的源起與發展，得分析相關文獻來加以重建。

(一)天啟四年《地緯》手稿筆記似乎未含「輿地全圖」

天啟三年正月，熊明遇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年在南京山麓建堂，取名華日樓，其中青玉堂為書屋，並撰《華日樓記》。⁶³ 子人霖攜妻喻宜英（1605-1648）奉母朱維行（1579-1661）移居南京。冬，女生於南京，因名南英。⁶⁴ 這年八月，在李之藻協助下，艾儒略在杭州出版《職方外紀》。根據熊人霖的自述，

幼從大人宦學，賜金半購甲經，……周遊赤縣，請教黃髮，趨庭而問格致，謀野以在土風。時天子方懷方柔遠，欽若治時，象胥之館，九譯還重，疇人之官，四夷其守。畸人來於西極，《外紀》輯於耆英，異哉所聞，考之不謬。甲子之歲，歸自南都，玄冬多暇，閉關竹里。手展《方言》而三擿，心悟圓則之九重，地正象天，王者無外，遠彼梯楫，盡入聖代版圖，紀厥風謠。……余以此書弱冠少作，久塵笥中。⁶⁵

萬曆四十一年暮春，十歲熊人霖隨父從江西南昌北上，一路遊歷，至北京待補兵科給事中。在近兩年八個月的待補期間，他眼見熊明遇與黃髮西士交遊，學習西方格致知識。四十三年底，熊明遇補實兵科給事中。次年卻在黨爭中，遭人以他與東林黨通為由，彈劾他外調為福寧治兵使者。而後託病返鄉兩年，將所學西方自然知識整理為《則草》初稿。四十六年（1618），十五歲的熊人霖在江西進賢通過童

⁶³ 「余既構堂於京山之阿丘，……。」熊明遇，《文直行書》，文卷 2，〈華日樓記〉，頁 1a-2b。京山或指紫金山。

⁶⁴ 「癸亥，隨余奉母夫人居南京操院署。是冬，生長女，字曰南英。」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3，〈誥封喻恭人墓誌銘〉，頁 3a。

⁶⁵ 熊人霖，《地緯》，〈地緯自序〉，頁 1b-4b。萬曆三十六年熊明遇在南昌會城松陽門外東臯建新居，其中讀書與藏書的「綠雪樓」。萬曆四十四年七月在常德冊封榮世子與世子妃禮後，返回南昌東臯竹里。「醴陵接壤萍鄉，……，抵會省東臯竹里，熊子之草堂也。」熊明遇，《綠雪樓集》，《履草》，〈南征記〉，頁 11b；熊明遇，《文直行書》，文卷 15，〈桐封記〉，頁 1a。天啟三年在南京的京山之麓建堂，或又稱京山堂，熊人霖讀書其中。天啟三年冬由南京返回南昌竹里。「熊子與喻子仲文相友善，十四年于今矣。而朝夕觚翰者十年。……余居竹里，則與仲文讀書綠雪樓。已居京山，則讀書京山堂。而仲文亦從南郭徙京山之西，則題其居之堂曰冠山。」熊人霖，《南榮集》，文卷 17，〈冠山稿引〉，頁 16a。

子試，⁶⁶ 翌年隨父赴福寧就任，隔年眼見《則草》問世。簡言之，熊人霖從幼年到青少年見證父親學習西學與出版《則草》。

天啟三年《職方外紀》出版後，熊明遇似乎獲贈一本，依此熊人霖才有機會將此書攜回南昌竹里，在綠雪樓參閱此書。十餘年來在父親身側耳濡目染西學的影響，他利用天啟三年至四年間的寒冬空暇，大量引述或改寫《職方外紀》內容，於天啟四年完成《地緯》初稿。相較於熊明遇學習西學約十年，經過深思熟慮後，年逾不惑才出版《則草》，熊人霖只用一個冬季就將《職方外紀》內容予以摘要或改寫，成為他首次吸納西學的筆記。

雖然手稿失佚，其中是否有「輿地全圖」，不得而知，還是可做一些推論。如果手稿只是學習西方地理知識的筆記或參考，離日後出版還有一段不小的差異，內容極可能只涵括日後刊刻《地緯》中的五大洲與海的部分。另一方面，在日後刊刻的《地緯》中，未見摹繪《職方外紀》「萬國全圖」或任一大洲的地圖，遑論自行創立「輿地全圖」這一幅與眾不同的世界小圖。依此筆者認為天啟四年《地緯》手稿中尚未繪製「輿地全圖」。

綜言之，儘管長期追隨父親遊歷多方，接觸耶穌會士，熊人霖在父親身側耳濡目染西學的影響，天啟三年有機會將《職方外紀》攜回南昌竹里，詳閱此書，利用寒冬空暇熱衷書中世界地理知識，筆記他首次吸納的西學，撰寫《地緯》手稿。弱冠之年的熊人霖，雖具秀才身分，但是尚未出人頭地，須在舉業上力爭上游。因此，他不得不將手稿擱置於竹製的方形箱中。直到崇禎年間，以該文來會友後，才經歷日後出版前必要的修改歷程。

(二)從初稿到出版前的修改

在天啟四年產生《地緯》手稿後，到崇禎十一年初刻以前，《地緯》可能經過修訂，主要來自陳子龍 (1608-1647) 與錢棟 (1619-1645) 兩位友人的建議。陳子龍，字臥子，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人。明末著名詩人與文學家，與錢謙益 (1582-1664)、吳偉業 (1609-1672) 齊名。著有《皇明經世文編》、《陳忠裕公全集》、《安雅堂稿》等。另一位意見諮詢者是錢棟，字仲馭，號約庵，嘉興府嘉善縣魏塘鎮人。錢士升 (1574-1652) 次子，歷南都兵部職方主事，升吏部文選郎中，著《南園唱和集》、《新儒園詩文集》、《文部園詩》。

⁶⁶ 「戊午，大人方左遷閩臬，余試童子，為貞父黃師手拔。」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13，〈誥封喻恭人墓誌銘〉，頁2b。

對明清士人而言，科舉考試成功是眾所認可的最大肯定。崇禎六年八月，熊人霖參加江西鄉試中舉。⁶⁷ 隨後北上赴京準備次年的會試，經過桐城會見方以智(1611-1671)，⁶⁸ 繼續北上在山東汶上遇到夏允彝(1596-1645)。夏允彝，字彝仲，號瑗公，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崇禎二年，他與陳子龍、徐孚遠(1599-1655)、彭賓(1604-?)、杜麟徵(1595-1633)、周立勛(1598-1640)六位華亭人組成幾社。他向熊人霖推崇陳子龍的詩。⁶⁹ 翌年三月，熊人霖第一次參與會考，結識陳子龍與錢樛兩位朋友，影響《地緯》一書的修訂與刊刻。三年後，熊人霖、夏允彝、陳子龍與錢樛等人捲土重來，都進士及第。

關於封存於塵中的《地緯》手稿何時被取出修改，〈地緯自序〉提供一個參考時間：「甲戌上公車，臥子陳君一見，謬加青黃。」⁷⁰ 此一記載顯示崇禎七年(甲戌，1634)三月，《地緯》書稿從塵封的竹製方形箱中取出，向文人請教。表面來看，崇禎七年熊人霖上京赴考時攜帶《地緯》書稿，請陳子龍指正。這樣的說法有些勉強，因為熊人霖為何攜帶一本塵封甚久的手稿到北京去參加會考呢？比較合理的說法是熊人霖與陳子龍在該次會試會面，且兩人都落榜。回到江南後，熊人霖拜會幾社名士。文人相交，以文會友。熊人霖出示《地緯》書稿，請友指教，陳子龍的反應是不能妄加黑白是非。當時熊人霖尚未在舉業上更進層樓，似乎不會就此請教父親，因此選擇偏向年齡相近的文士。

通過與幾社名士交往，熊人霖將陳子龍列入「明文大家」中，對他有不少記載，反應兩人間的交往不同尋常。崇禎七年春分過後，熊人霖與陳子龍和夏允彝在詩文上有不少切磋之處。

甲戌春明數過，從二子言詩文，讀幾社諸作，大抵頗反竟陵所尚，而臥子詩獨鍾鍊，亦不阿弇山強弩之末。⁷¹

⁶⁷ 「癸酉、丁丑，霖舉于鄉國，先生持書為大人賀。」同前引，卷 12，〈南太宰後如涂公神道碑〉，頁 1b。

⁶⁸ 「癸酉，北上過天柱，邂逅密之。」同前引，卷 11，〈明文大家說〉，頁 2a。

⁶⁹ 「過汶上邂逅夏彝仲，仲喜品藻倫物尚經濟，至詩文則推臥子不置口。」同前引。

⁷⁰ 熊人霖，《地緯》，〈地緯自序〉，頁 4b。

⁷¹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1，〈明文大家說〉，頁 2a-2b。竟陵為明晚期小品文的一個代表流派，包括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7)等，均為竟陵(今湖北天門市)人，故稱為「竟陵派」。弇山為明代文學上「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1526-1590)之別稱。

崇禎十年，三人進士及第，陳子龍授廣東惠州府司理，熊人霖知浙江義烏，夏允彝任福建長樂知縣後，仍會面論詩。陳子龍與熊人霖同遊湖州弁山與義烏雲黃山，並撰詩相互推敲。

丁丑，余與彝仲、臥子同登。及臥子李越，而余令婺之烏孝，簿書期會，數得言詩。臥子于七言律論之甚精。……同遊弁山暨雲黃山，各有律詩，互極推敲。⁷²

熊人霖編《初盛唐詩選》，陳子龍為其撰〈熊伯甘初盛唐詩選序〉。

熊伯甘，方今詩人之雄也，為政之餘，旁及風雅。因取唐人律詩，自景龍之後，大曆以前，凡數百首，評而梓之。夫詞莫工於初唐而氣極完，法莫備於盛唐而情始暢，近體之作，於焉觀止。⁷³

除了論詩，陳子龍亦與熊人霖論文體，在這個脈絡中，以《地緯》的文體為例。在〈地緯敘傳〉中，熊人霖表達其文體訴諸的對象是中國士人，將《地緯》與《禹貢》、《詩經·國風》、《山海經》與《淮南子·訓方篇》關連在一起。

圜則九重，渾行無窮，爰有大氣，舉地其中。大閱萬物，儷天代終，離水火氣，澤庫山崇。根着浮流，億野攸同，鴻荒乃攢，維禹之功。緯行《禹貢》，俗著〈國風〉，嗟若海外，縣隔不通。《山經》放云，〈訓方〉靡容。

天子明聖，化暨無窮，重譯慕義，自西徂東。獻其圖經，象攤理瑩，具論于篇，以備採風。述《地緯》。⁷⁴

⁷²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1，〈明文大家說〉，頁 2b。浙江義烏，古稱烏孝。秦王嬴政二十五年（222 BC）建縣，名烏傷，屬會稽郡。傳說秦時有位事親至孝的顏烏，父死後負土築墳，一群烏鴉銜土相助，烏鴉嘴喙皆傷，故稱烏傷縣。王莽時改名烏孝。元代江義烏隸屬婺州路總管府。或許因先前歷史背景，熊人霖自稱「余令婺之孝烏」。李，古同理。李越，指在越任司理官員。崇禎十年，陳子龍中進士，授廣東惠州府司理。

⁷³ 陳子龍，《安雅堂稿》上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 2，頁 112-113。

⁷⁴ 熊人霖，《地緯》，〈地緯敘傳〉，頁 1a-1b。

熊人霖向陳子龍與錢棟出示所著《地緯》，兩人都讀過〈地緯敘傳〉，陳子龍還知道錢棟對〈地緯敘傳〉的看法。

至論文則以為體裁不謬，乃曰：「成章如君所作《地緯》，錢仲馭謂是《山經》、《穆傳》、《水注》、《草木疏》一派文字，真知言也。」⁷⁵

當熊人霖由弱冠之年步入三十而立時，從崇禎七年起，他似乎不止一次請陳子龍與錢棟對《地緯》提供意見，並加以修改，直到陳子龍「促余刻之，勿再增損。」此時約在十一年夏，錢棟也催促他可付印。「戊寅之夏，仲馭錢君復為憇，輒以授梓，用備采芻。」⁷⁶

從崇禎七年春末至十一年夏，其間四年多，陳子龍與錢棟給熊人霖什麼建議，使他不斷修改《地緯》，其間修改了什麼，雖無資料細載，或可從相關文獻來推論一二。在〈明文大家說〉中，熊人霖記載陳子龍對他文體提出不少見解，其中以《地緯》為例時，還提到錢棟的見解，反映兩人在此書文體方面有過一些建議。⁷⁷陳子龍為《地緯》一書的修改付出不少心力，熊人霖請他為《地緯》寫序，而陳子龍思量數次，自估無法像郭璞(276-324)注釋《山海經》與作敘，⁷⁸而作罷。

及余求弁言，則辭曰：「亦曾構思數次，戛戛難哉！此序若不能如郭璞之敘《山經》，何以贅為。」⁷⁹

無論是〈地緯敘傳〉，還是錢棟對〈地緯敘傳〉的看法，以及陳子龍曾參照郭璞注釋《山海經》所作的敘，都反映富有圖文的《山海經》與郭璞敘是陳子龍與錢棟重要的參照。儘管陳子龍與錢棟都不長於西學，遑論世界地理，不過兩人都關切經世致用之學，基於富有圖文的《山海經》是兩人重要的參照，很可能對《地緯》一書在地圖上與中國天地人三才中的定位，建議做些補充。如果上述推論與相關文

⁷⁵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1，〈明文大家說〉，頁 3a。

⁷⁶ 熊人霖，《地緯》，〈地緯自序〉，頁 4b。

⁷⁷ 「且曰：『文各有體裁，……』又嘗謂余曰：『公移之體貴在明暢，君每以古文行之，不思獻古文覽弗省語乎？』又嘗曰：『君金石之文。』」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1，〈明文大家說〉，頁 3a-3b。

⁷⁸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附錄·東晉郭璞注山海經敘〉，頁 478-480。

⁷⁹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 11，〈明文大家說〉，頁 2a。

獻相符，《地緯》首節〈形方總論〉與最後兩節〈輿地全圖〉和〈地緯繫〉是在崇禎七年至十一年間補充的。

綜言之，熊人霖在弱冠之年所撰《地緯》初稿塵封於竹製的箱器中，直到而立之年才向陳子龍與錢棟請益，建議他在地圖等方面做些補充，而著手修改。下節則聚焦於《地緯》中「輿地全圖」與相關內容的分析與詮釋。

六、崇禎十一年初刻《地緯》中的「輿地全圖」

雖然《地緯》內容大量地摘引或改寫自《職方外紀》，卻不像《職方外紀》先有「萬國全圖」，而後是各洲地圖，「輿地全圖」是《地緯》中唯一的一幅小世界地圖，出現在該書倒數第二節，也就是第八十一節〈地圖〉中，因此引起筆者對過去未曾提出的兩個問題感到好奇：〈地圖〉此一小節在《地緯》中是否有其特殊旨意？為何「輿地全圖」會出現該小節中，它是否有其特殊的旨意？

筆者發現：熊人霖在介紹人所在的大地有五大洲，以及圍繞它們的海洋後，需要有一節來統整它們，既能展現五大洲的陸地與海洋，以及地與海總體為一圓球。於是，他基於熊明遇《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與其相關說明，加以選擇與調整，拋棄其中隱含的天，只留下輿地的部分，改為「輿地全圖」與其相關說明。

到熊人霖於崇禎十一年刊刻《地緯》時，他可以參考的世界地圖與說明，與他父親於天啟六年增補《則草二》時相比，至少多了一幅熊明遇〈圓地總無罅礙〉的「坤輿萬國全圖」與相關說明。天啟六年九月，熊明遇留下增補的《則草二》，動身前往貴州平溪衛，熊人霖得以參閱《則草二》中的「坤輿萬國全圖」與相關說明。當時尚未修訂《地緯》手稿，《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與相關說明可供他日後增補《地緯》參考之用。

不像《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旨在加強說明船航行於水多地少的圓球上，《地緯》「輿地全圖」則在凸顯五大洲陸地，又能明顯表達海洋，二者合成為圓球的輿地，因此熊人霖乃將與陸地鄰近的海塗黑，在視覺上凸顯陸地與海的對照，此一作法在當時頗為罕見。中國傳統認為海水黑晦，⁸⁰不清楚熊人霖是否因此而以黑色來表海。當時有以點狀來表達海，如章潢《圖書編》「輿地山海全圖」（見圖五）。較常見的是以水流的波浪狀來表達海，如明代的海防圖或海運圖中採此畫

⁸⁰ 「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劉熙撰，《釋名》（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1，〈釋水第四〉，頁8a。

法，⁸¹ 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艾儒略「萬國全圖」就採此一畫法，《兩儀玄覽圖》用類似魚鱗狀的波浪狀來呈顯海。

現存《函宇通》本《地緯·地圖》中有一「輿地全圖」和相關說明，筆者認為係基於熊明遇《則草二》中的「坤輿萬國全圖」與相關說明，加以調整或修改。茲先介紹《地緯·地圖》內文說明的部分。

輿地圖原是渾圓，經線俱依南北極為軸，東西衡貫者，則赤道緯線也。總以天頂為上，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宋人言：「天旋如磨，磨下許多粉，凝結為地。」又言：「海那一岸與天相粘。」皆屬管中之窺。行海者，測量于天，如行赤道南，見南極出地三十餘度，又進赤道北，見北極出地三十餘度，則二處正為人足相對。其餘行度多寡，可類推矣。⁸²

這段引文與《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的說明存在諸多相似或相同之處，只是字句的組合與次序有些不同。

……隨人所戴履，處處是高，四面處處是下，所謂天地無處非中也。
……

宋儒言：天旋如磨，〔磨〕下許多粉子凝結為地，可一大噓。又言：「海那一岸與天相粘」，皆屬管中之窺。

後坤輿圖原是渾圓，經線俱依南北極為軸，東西衡貫者，則赤道線也。行海者，其行雖在地上，其測量却在天上。如行赤道南，見南極出地三十餘度；又進赤道北，見北極出地三十餘度，則二處正為人足相對。總以天頂為上，其餘行度多寡，可類推。亞細、歐邏、利未、南墨、北墨，五大州也。⁸³

值得注意的是，兩者有關宋儒或宋人的兩句引文相同，只是熊明遇對它們有負面評論，熊人霖則沒有。更何況在天啟六年《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出現以前，熊

⁸¹ 樓錫淳、朱鑿秋編著，《海圖學概論》（北京：測繪出版社，1993），頁 86-87。

⁸² 熊人霖，《地緯》，〈地圖〉，頁 187a。

⁸³ 熊明遇，《則草》（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本），《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 14a-14b。

明遇已在萬曆末年《則草》中批判宋儒，當然亦有肯定朱熹之處。而《地緯·地圖》中的引文則是此書唯一提到宋儒之兩處。因此較合理的推論是：熊人霖基於熊明遇《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中有關的論述，再加以選擇與改寫，刪除不符旨意之處。

《則草二》與《地緯》兩段引文中對圖名的稱呼不同，《則草二》以「坤輿圖」來表達「坤輿萬國全圖」，《地緯》則使用「輿地圖」反映「輿地全圖」。如將《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見圖九）與《地緯》「輿地全圖」（見圖二）加以比較，不難發現二圖內的形狀非常相似，其中的圖示與文字間存在下列的相似與差異之處。

1. 二圖都標示出北極與南極所在處，並依其理解東西方位的立場，將圖右方標示為東，左方則為西。

2. 「坤輿萬國全圖」外圍第一圈空白，第二圈以黑白相間的曲線段來表示緯線，保留天地間的關連，但未留下任何度數的標記；「輿地全圖」則拋棄其中隱含的天，只留下輿地的部分，外圍兩圈都空白。

3. 「坤輿萬國全圖」內橫向的中央有兩條直線橫貫東西，以黑白相間表示赤道的經度，保留天地間的關連，但未留下任何度數的標記；「輿地全圖」拋棄其中隱含的天，留下空白的兩條直線。

4. 「坤輿萬國全圖」中有「晝長線」三字與「晝短線」三字，但未在圖上標示二線，但是有北極圈線與南極圈線；「輿地全圖」則闕如。

5. 「坤輿萬國全圖」大洲名稱由東至西分別為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北亞墨利加、南亞墨，以及未標名稱的北極與南極附近的陸地；「輿地全圖」除了北亞墨與南極的墨瓦臘，其餘皆同。

6. 二圖都將北亞墨（利加）與南亞墨移至左方，亞細亞、歐邏巴與利未亞則移至右方。

7. 二圖從東至西海洋名稱有四，分別為：大明海、小西洋海、大西洋海、平浪海。

8. 在「坤輿萬國全圖」中，亞細亞、歐邏巴與利未亞間的陸地相連；「輿地全圖」中三大洲為海洋將彼此區隔。

根據上述八點的對比，就整體輪廓的呈現而言，「輿地全圖」較「坤輿萬國全圖」來得清晰。這部分涉及《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與《地緯》「輿地全圖」於各自所在小節中的意旨或目的不同。不同於「坤輿萬國全圖」旨在加強說明船航

行於水與土合成且水多地少的圓球上，「輿地全圖」則刻意以黑色暗影為圍繞著大洲陸地周圍附近的海，既凸顯五大洲的陸地，又清楚表達海洋。

七、結語：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

是中國士人將西方世界地圖在地化的兩個特殊案例

過去雖對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頗感興趣，可是有關二小圖的繪製者、出處與彼此關連，以及是否受利瑪竇或其他世界地圖影響，見解不一。明末耶穌會派遣受過良好教育的會士到亞洲與美洲進行遠距傳教，成為首個全球化的機構，⁸⁴ 不但蒐集所在國的各種知識回傳，也注重將西方學術在地化，本文乃從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的在地化角度，來考析二小圖，認為它們在地圖文化史上有以下一些值得進一步闡釋的歷史意義。

首先，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將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使中文世界地圖產生變化。過去偏重耶穌會士引入哪些中文地圖，而後士人依據或參考哪些西方人繪製的世界地圖，在中文書籍中呈現改繪的世界地圖，似乎因其新奇而預設了地圖繪製的進步。本文則針對中西兩種地圖傳統的遭遇，提出一個與地圖交流有關的問題，主張十七世紀前半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涉及兩種不同層次與方向的在地化問題。一種是利瑪竇基於西方繪圖傳統，繪製多幅中文世界地圖，針對熟悉中國位於地中的士人，折中性地將中國移到圖的中央位置，並加入諸多天文與宇宙論的自然知識，以及世界各國地理知識，吸引中國士人學習。接著，中國士人雖參考利瑪竇中文世界地圖，在既有的諸多傳統見解中，加入利瑪竇帶來的新奇地圖。譬如，馮應京與章潢在各自的博物式輯作《月令廣義》與《圖書編》中，加入「山海輿地全圖」與「輿地山海全圖」。在摹繪時，受限於書冊大小，做出一些簡略的選擇或調適，中國都出現在圖的中央位置。其目的在新奇之處，而不在嘗試了解或學習西方繪圖相關傳統，成為西方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兩個案例。

其次，在類似的意義下，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是西方世界地圖傳入中國，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兩個相互關連的特殊案例。每幅

⁸⁴ Steven J. Harris, "Mapping Jesuit Science: The Role of Travel in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in John W.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212-240.

地圖皆有其歷史起源與背景，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亦不例外，只是後人不一定能說清楚每幅地圖的起源與歷史背景。由於熊明遇父子留下相當豐富的文獻，加上先前的研究，使得筆者得以另闢蹊徑，回到明末中西士人自然與地理知識的交流，從熊明遇與熊人霖的生平與著作來分析與考釋二小圖的圖文，追溯它們的起源與曲折的歷史，提出與先前研究不同的結果。

第三，熊明遇採用「坤輿萬國全圖」名稱，這是他唯一明確提到西士著作。中國古代雖有標點符號的發展，⁸⁵ 一般文集或筆記中未發展出明確區別摘引和評論的傳統，和與之明確相應的標點符號系統，直到二十世紀前半新文化運動開始推動中文標點符號化。⁸⁶ 回到十七世紀前半《則草》與《格致草》這兩本筆記，其中大量引述中西士人著作，熊明遇雖提到「西經」、「西域圖書」、「西域圖經」、「西域書」、「西方人」、「西域人」、「西極人」、「歐邏巴人」、「四方諸儒」、「新法西書」、「西曆」等，但未標示任何耶穌會士人名與其著作名稱，或許他認為無此必要。《則草二》與《格致草》中「坤輿萬國全圖」參考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受其影響，有諸多借鏡之處，「坤輿萬國全圖」是二書中唯一明確提到西士著作名稱之處。

第四，不同於當時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將中國畫在右側邊緣位置，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折中性地將中國移到較接近中央的位置，是他將西方世界地圖初步在地化的一個突出的特性。然而，在《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與《格致草·圓地總無罅礙》「坤輿萬國全圖」中，熊明遇刻意將中國移回圖右側邊緣，像似當時西方標準世界地圖中的位置，造成其與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最大的不同。於是，其源起乃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過去試圖通過當時西方世界地圖，來找尋繪製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的母本。在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問世以前，甚至在萬曆年間，他已提到「西域圖經」，可能就看過耶穌會士帶來的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天啟五年，熊明遇遭矯旨革職。那時他閱讀傅汎際與李之藻合作翻譯的《寰有詮》初稿，並在增添的《則草二》中引用《職方外紀》內容。他認同地是圓球，而非方隅，中國不在地中，有意將其移至不是中央的位置，有別於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將中國置於中央的位置，他可能諮詢傅汎際或艾儒略等耶穌會士，進而一睹或了解耶穌會士帶來

⁸⁵ 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⁸⁶ 袁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332-342。

的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其中最有可能仍是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事實上，《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坤輿萬國全圖」與相關文字，反映其中混合了來自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艾儒略《職方外紀》，以及當時類似奧特里烏斯《地球大觀》般西方標準的投影世界地圖的影響。

比較整體的考量是回到熊明遇生平與《則草》和《格致草》，去了解書中「坤輿萬國全圖」的源起。《則草》和《格致草》是兩本以西學來考據中國傳統自然知識的作品，通過熊明遇生平與對《則草》進行文獻分析，了解他接受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乾坤體義》中兩個圓球式宇宙論，亦受徐光啟〈題萬國二圖圖敘〉的影響，〈圓地總無方隅〉認為地圓，而非方隅，《格致草》〈周髀辨〉、〈渾註辨〉與〈天中辨〉以天圓地圓來批判蓋天說、渾天說與中國位於地中的見解。⁸⁷簡言之，熊明遇相信地圓，而非方隅，認為中國不在地中，因此《則草》和《格致草》對中國地中進行一些間接與直接的自然知識考據。在其「坤輿萬國全圖」中，不再隨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將中國置於中央位置，反而刻意將其移到邊緣，提供與其著作一致的說明。

先前馮應京《月令廣義》與章潢《圖書編》這兩本博物式作品，在諸多傳統見解中，基於新奇而納入「山海輿地全圖」與「輿地山海全圖」，但是受限於書籍尺寸，所摹繪的圖不但變小，內容也相當簡略，這兩幅西方世界地圖係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小圖，無須出自耶穌會士之手。類似地，從《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坤輿萬國全圖」出現的特殊脈絡與源起來看，此圖旨在說明船航行於水多地少的圓球上，是「可航而歷也」。受限於書籍尺寸，所摹繪的圖也變小，內容也相當簡略，繪製與刻印得較粗糙，反映熊明遇做出的選擇、調適與強調，亦是西方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一個特殊案例，不像是出自耶穌會士之手。

第五，同一個海在地理知識傳播中，或有不同的名稱。譬如，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 (Fernão de Magalhães, 1480-1521) 在 1520 年 10 月 21 日率領五艘船穿越南緯五十多度的麥哲倫海峽，經過三十八天的驚濤駭浪後，11 月 28 日到達一個平靜的洋面，他稱其為 *Mare Pacificum*，意謂「寧靜的海洋」或「平靜的海洋」，也就是今日的南太平洋。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稱為寧海，《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亦為寧海，《職方外紀》稱太平海。熊明遇或許聽耶穌會士提到麥哲倫通過驚濤駭浪的麥哲倫海峽，來到一個風平浪靜的海，乃取「風平浪靜」中的「平浪」，

⁸⁷ 徐光台，〈李之藻與徐光啟在西學翻譯的不同取向：以對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的反應為例〉，收入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 (201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5。

稱其為平浪海。熊人霖在「輿地全圖」中沿襲此一名稱，父子二人可能是歷史上唯二稱其為平浪海者。

第六，另一個例子是明代稱現今的東海為大明海，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與天啟六年《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都記為大明海。明清鼎革，熊明遇父子成為明遺民，避隱福建書林。清順治五年熊志學將《格致草》與《地緯》於當地合刊為《函字通》時，熊明遇修訂《格致草》部分內容，將《則草二》「坤輿萬國全圖」中的大明海，改為華夏海，成為明遺民科學下地理知識的一個獨特的案例，他成為明遺民科學的先驅者。

相對地，《地緯》「輿地全圖」中依然沿襲先前大明海的名稱，顯示熊人霖從《地緯》初稿到《函字通》本《地緯》，父子間似乎未討論利瑪竇世界地圖。

在明末西學傳入前，「輿地全圖」此一名稱先前已出現在《籌海圖編》⁸⁸ (1540) 與王在晉編纂《海防纂要》⁸⁹ (1613) 中。〈籌海圖編凡例〉指出，「是編為籌海而作，必冠以輿地全圖者，示一統之盛也。」⁹⁰ 上述二書皆為明代浙江海防著作，其中的「輿地全圖」至多只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圖，而《地緯》「輿地全圖」則是一幅世界地圖。熊人霖在浙江義烏知縣任內刊刻《地緯》，取「輿地全圖」此一名稱，或許受先前海防著作中「輿地全圖」名稱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七，崇禎初年熊明遇開始將《則草》擴增為《格致草》時，改變對亞洲名稱的翻譯，影響熊人霖在相關議題上的更動。

《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記載著「亞細、歐邏、利未、南墨、北墨，五大州也」，⁹¹《函字通》本《格致草·圓地總無罅礙》改為「瞻納、歐邏、利未、南墨、北墨，五大州也」，⁹² 顯示熊明遇以「瞻納」取代「亞細」是在崇禎元年開始擴充為《格致草》以後做出的變更。由於華日樓本《格致草》已失佚，如果《函字通》本《格致草》中該處文字沿襲華日樓本，則華日樓本在 1630 年代後期做出此一改變。至於熊明遇為何會以「瞻納」來取代「亞細」，仍是一個待解的問題。⁹³

⁸⁸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3。

⁸⁹ 王在晉纂，《海防纂要》，《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654。

⁹⁰ 鄭若曾，《籌海圖編》，〈籌海圖編凡例〉，頁 11。

⁹¹ 熊明遇，《則草》（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本），《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頁 14b。

⁹² 熊明遇，《格致草》，〈大造畸說〉，頁 151a。

⁹³ 《職方外紀》中提到海外傳聞尊稱亞細亞為大知納，過去認為熊明遇將「知」與「瞻」混用。艾儒略原著，《職方外紀校釋》，卷 1，〈亞細亞總說〉，頁 32-33 註 6；馬瓊，《熊人霖《地緯》研究》（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8），頁 98；Zhang Qiong, *Making the New World*

遵循《職方外紀》卷一〈亞細亞總說〉，天啟四年《地緯》初稿稱亞洲為「亞細亞」，而有〈亞細亞總說〉。《函宇通》本《地緯》改為〈大瞻納總志〉，在該節末尾，熊人霖指出是其父熊明遇將「亞細亞」改為「大瞻納」。「徐玄扈先生原因西書稱亞細亞，家君改定今名。」⁹⁴ 顯示熊明遇或與徐光啟就此問題討論過，時間可能在崇禎初期。崇禎二年四月，熊明遇陞兵部左侍郎，徐光啟禮部左侍郎。熊明遇旋因避權而請調南京刑部尚書，七月離職。九月，徐光啟奉旨開局纂修《崇禎曆書》。三年六月，徐光啟陞禮部尚書。四年六月，熊明遇拜兵部尚書。五年七月解組歸鄉。六年八月，子人霖在江西鄉試中舉。十月初七，徐光啟病逝北京。

最後，不像《職方外紀》在起始處就展現「萬國總圖」，⁹⁵ 接著的是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北輿地圖、南輿地圖等區域圖，⁹⁶ 《函宇通》中的《地緯》並未在介紹各洲時跟進任何一個地圖。《地緯》中的「輿地全圖」與相關說明是基於其父《則草二》中的「坤輿萬國全圖」和相關說明而調整與更動的，因此，可說是士人間將西方世界地圖於另一層次與方向在地化的特殊案例衍生的結果，與《職方外紀》中的世界地圖無關。

（責任校對：王思齊）

Their Own: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Jesuit Science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eiden: Brill, 2015), p. 336, n. 161. 混用說未能解說為何《則草二·圓地總無罅礙》已參考《職方外紀》，但仍使用「亞細」，而未改用「瞻納」。

⁹⁴ 熊人霖，《地緯》，〈大瞻納總志〉，頁 2a。

⁹⁵ 艾儒略，《職方外紀》，頁 27-28。

⁹⁶ 同前引，頁 30-31、40、55-56、61-62、71、72。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在晉纂，《海防纂要》，《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艾儒略 (Giulio Aleni)，《職方外紀》，收入葉農整理，《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 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朱 熹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 朱 熹集撰，朱傑人點校，《詩集傳》，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 李之藻編，《天學初函》，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 * 利瑪竇 (Matteo Ricci)，《坤輿萬國全圖》，收入利瑪竇著，朱維錚主編，《利瑪竇中文著譯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7-278。
- 利瑪竇撰，《乾坤體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故宮博物院藏本複印。
- 利瑪竇輯，畢懋康演，《乾坤體義》，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藏明萬曆年間刻本。
- 陳子龍，《安雅堂稿》上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 袁 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章 潢，《圖書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68-9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故宮博物院藏本複印。
- 傅汎際譯，李之藻達辭，《寰有詮》，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8 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 馮應京輯，戴任增釋，《月令廣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64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清華大學藏明萬曆陳邦泰刻本複印。
- 楊廷筠編，《絕徼同文紀》，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 (1615) 本。
- 熊人霖，《南榮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十六年 (1643) 刊本。
- _____，《地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 (1648) 書林友于堂熊志學刻本微捲。
- * _____，《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日本內閣文庫藏清順治年間刻本。
- * 熊志學編，《函宇通》，美國國會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 (1648) 書林友于堂熊志學刻本。

- * 熊明遇，《則草》，中國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
 _____，《格致草》，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 6 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1648）書林友于堂熊志學刻本複印本。
- * _____，《綠雪樓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8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天啟年間本影印。
- 熊明遇撰，熊人霖編，《文直行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劉熙撰，《釋名》，新北：藝文印書館，1966。

二、近人論著

- 方 豪，《李之藻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_____，《中西交通史》下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
- 石云里，〈《寰有詮》及其影響〉，收入薄樹人、劉金沂、徐振韜、王立興、李競等主編，《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 6 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232-260。
- 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林東陽，〈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及其對明末士人社會的影響〉，收入羅光主編，《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83，頁 311-378。
- 洪健榮，《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 徐光台，〈西方基督神學對東林人士熊明遇的衝激及其反應〉，《漢學研究》，26.3，臺北：2008，頁 191-224。
 _____，〈李之藻與徐光啟在西學翻譯的不同取向：以對西方兩個圓球式宇宙論的反應為例〉，收入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201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頁 1-25。
- 袁 暉、管錫華、岳方遂，《漢語標點符號流變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馬 瓊，《熊人霖《地緯》研究》，杭州：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8。
 _____，〈《地緯》的成書、刊刻與流傳〉，《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8.4，無錫：2009，頁 72-76。
- *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馮錦榮，〈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收入羅炳綿、劉健明主編，《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1993，頁117-135。

_____，〈格致草提要〉，收入薄樹人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天文卷》第6冊，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頁51-52。

管錫華，《中國古代標點符號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2002。

樓錫淳、朱鑒秋編著，《海圖學概論》，北京：測繪出版社，1993。

- * 龔纓晏、馬瓊，〈《函宇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文史知識》，4，北京：2003，頁87-94。

海野一隆，〈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系世界圖——主として新史料の検討〉，收入山田慶兒主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頁507-580。

- * Harris, Steven J. "Mapping Jesuit Science: The Role of Travel in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in John W.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212-240.

Lindberg, David C. *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600 B.C. to A.D. 1450*. Chicago/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Zhang, Qio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Jesuit Science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eiden: Brill, 2015. doi: 10.1163/978900428438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Gong, Yingyan & Ma Qiong. "Han Yu Tong ji qizhong de Liangfu Shijie Ditu (On Two World Maps in the Han Yu Tong)," *Wenshi Zhishi (The Knowled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4, 2003, pp. 87-94.
- Harris, Steven J. "Mapping Jesuit Science: The Role of Travel in 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in John W. O'Malley et al. (eds.), *The Jesuits: Cultures, Sciences, and the Arts, 1540-177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p. 212-240.
- Huang, Shijiang & Gong Yingyan. *Limadou Shijie Ditu Yanjiu (A Study of Ricci's World Map)*.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Li, Zhizao (ed.). *Tianxue Chuhan (First Collection of Jesuit's Celestial Studies)*. Taipei: Student Books, 1965.
- Ricci, Matteo. *Kunyu Wanguo Quantu (Map of Whole World with Ten-thousand Countries)*, in Zhu Weizheng (ed.), *Limadou Zhongwen Zhu Yi Ji (Matteo Ricci's Works Written and Translated in Chinese)*.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1, pp. 217-278.
- Xiong, Mingyu. *Ze Cao (A Draft on Regularity)*. Ming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in Nangjing Library, Nangjing.
- _____. *Lu Xue Lou Ji (Collected Works Compiled in the Lu Xue Lou), Siku Jinhuishu Congkan (Siku Banned Books Series)*, Jibu vol. 185. Beijing: Beijing Press, 1995. Photocopy of Ming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and Nangjing Library.
- Xiong, Renlin. *Hetai Xiansheng Xiongshan Wenxuan (Collected Works of Xiong Renlin Compiled in Xiongshan)*. Qing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in Cabinet Library, Tokyo.
- Xiong, Zhixue (ed.). *Han Yu Tong (Works Containing the Whole Cosmos and Earth)*. 1648 woodblock print edition in Library of Congress in Washington and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World Map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On Xiong Mingyu's *Kunyu Wangguo Quantu* and Xiong Renlin's *Yudi Quantu*

Hsu, Kuang-tai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thsu@mx.nthu.edu.tw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world map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levels and directions. Matteo Ricci (1552-1610) initiated the first level and direction in his effort to persuade Chinese literati to engage with new types of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cosmological and map-making traditions, Ricci produced several world maps in which he moved China to the center, and moreover included western knowledge of cosmology, astronomy, and the calendar. Chinese literati attracted by Ricci's world map(s) were responsible for creating the second level and direction in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world maps in China, even though they had no intention of learning western map-making traditions. Limited by the physic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books, they produced small world maps. For instance, there are two such maps, the *Kunyu Wangguo Quantu* 坤輿萬國全圖 and the *Yudi Quantu* 輿地全圖, found in Xiong Mingyu 熊明遇's *Gezhi Cao* 《格致草》 and Xiong Renlin 熊人霖's *Diwei* 《地緯》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edited by Xiong Zhixue 熊志學 and published in 1648. Xiong Mingyu accepted the Aristotelian two-sphere model of the cosmos, believing that the shape of the Earth was spherical rather than square, and that China was not at its center. In 1626, in order to negate Zhu Xi 朱熹's view of the world and to show how ships could circumnavigate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Xiong Mingyu presented a small version of the *Kunyu Wangguo Quantu* in which he moved China from its central location to the eastern margins. Xiong Renlin modified this map to create the *Yudi Quantu*, which showed the five continental lands surrounded by oceans.

Key words: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world maps, Matteo Ricci, Xiong Mingyu,
Kunyu Wangguo Quantu, Xiong Renlin, *Yudi Quantu*

(收稿日期：2015. 2. 2；修正稿日期：2015. 5. 4；通過刊登日期：2015. 5. 26)